

2010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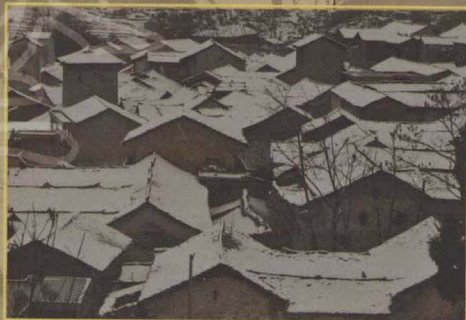
主 编◎李建军

副主编◎吕燕平 张定贵



屯堡文化研究

TUNPUWENHUAYANJIU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卷

主 编◎李建军

副主编◎吕燕平 张定贵

M
K281.1
10
2010



屯堡文化研究

凯里学院图书馆



0752228

捐赠图书

凯里学院图书馆
藏书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屯堡文化研究(2010 卷) / 李建军编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 - 7 - 221 - 09549 - 7

I. ①屯… II. ①李… III. ①汉族—民族文化—贵州省—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81.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7972 号

书 名 屯堡文化研究(2010 卷)

作 者 李建军 主 编 吕燕平 张定贵 副主编

贵州省屯堡研究会

贵州省屯堡文化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 苏 桦 彭 建

封面设计 龙 英

版式设计 亦 抒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 1 092 毫米 1/16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26.2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9549 - 7

定 价 48.00 元

《屯堡文化研究》编委会

顾 问：钱理群 龙超云 顾 久 陈华祥
陈海峰 徐 圻 陈 坚 周建琨
徐 静 林文勋 蓝 勇

编委会主任：李彦西

副主任：颜学丽

编委会成员： 王芳恒 帅学剑 孙兆霞 令狐荣涛
李彦西 李建军 李 晓 李 铁
(按姓氏笔画) 吕燕平 张承鹄 张富杰 张本强
张新民 吴 羽 林文勋 杨庭硕
杨昌儒 颜学丽 蓝 勇

主 编：李建军

副主编：吕燕平 张定贵

目 录

历史考析

屯堡的前世今生	
——从“抬汪公”民俗到吉昌契约文书的发现	万 明(3)
明清黔中屯堡的几个历史形态	吴 斌(7)
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	
——基于贵州明代卫学社会影响的考察	孙兆霞 雷 勇(21)
明代屯田下的黔中社会	颜建华 张莎莎(33)
论清代贵州“改卫归流”的意义	孟凡松(45)
明代安顺地区移民研究	吕善长(53)
历代军屯研究综述	张立新(67)
朱元璋南征之谜与安顺屯堡文化	朱光文(83)
从彝学视野探析普定路(府)始末	王继平(91)



明清黔中田土税赋政策及实践考察

——基于民族关系的视角 陈 斌(105)

《吉昌契约文书汇编》价值初识 孙兆霞 张 建(116)

读《吉昌契约文书汇编》回眸屯堡人曾经的生存状况 潘玉陶(127)

《吉昌契约文书汇编》首发式及地方文献与屯堡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 汪青梅(139)

事 象 释 读

屯保人供奉神榜的教育价值 许道云(145)

试论贵州雉文化的精神内核——还坛神信仰 王芳恒(152)

地戏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与黔中族群关系的演变 ... 吴晓萍 杨文谢(161)

屯堡地戏:是仪式性戏剧还是表演性戏剧? 张定贵(170)

贵州安顺鲍屯的信仰习俗探析 彭 瑛(182)

关于屯堡人家“过血河”的田野调查 吴之俊(192)

贵州安顺地戏面具的象征人类学阐释 韦明顶(202)

安顺地戏演出的四种类型

——基于地戏现状调查的个人看法 朱发猛(209)

关于地戏传承现状及走向的思考

——以普定马官为例 汪东波(216)

原生态屯堡地戏的近代发展与变迁

——贵州安顺兴红村苗族地戏调查 秦发忠(224)

试论贵州地戏现状与发展构思 张美华(233)

安顺屯堡服饰的艺术特征	何雪蕾(240)
为“屯堡”正音	杨汝祥(247)
屯堡方言里遗存的《红楼梦》俗语	王贤华(250)

族群研究

文化的认同与特化

——走向现代旅游市场的传统屯堡仪式	彭兆荣 葛荣玲(259)
-------------------------	--------------

从“菩萨们的恩怨”看黔中屯堡村寨的社会统合

——以九溪村的抬舆仪式为例	张 原(266)
---------------------	----------

屯堡汉族亚文化族群的变迁和延续

——基于生态学 meta - 种群理论模型	陈姝凝(275)
-----------------------------	----------

屯堡丧事原生态的开堂点主与祭奠礼仪式

——屯堡人古老的亲子鉴定	石林元(283)
--------------------	----------

屯堡族群通婚圈的社会人类学考察	周贤润(292)
-----------------------	----------

屯堡人的精神坚守	杨有维(304)
----------------	----------

实务探究

试论屯堡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建构性保护	吴 羽 赵世钊(309)
----------------------------	--------------

如何推出屯堡文化乡村游

——以九溪村为例	唐应龙 唐应杰(317)
----------------	--------------

屯堡建筑风貌的保护与利用探析	张本强(322)
----------------------	----------

屯堡旅游与安顺旅游产业整合发展研究	赵世钊 李彦西(330)
-------------------------	--------------



非宗族传统资源的现代利用

——以安顺市鲍屯村为例 曹 婕 梁胜初(336)

学术研究深度决定文化旅游成败

——对屯堡文化经济开发的思考 唐应杰 唐应龙(345)

文化综观

文化自觉与屯堡文化研究 李建军(355)

屯堡文化空间探析 吕燕平(362)

屯堡文脉研究 胡赤兵 李彦西(372)

《在文明与乡野之间——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人类学考察》读后

..... 李 立(381)

屯堡文化传承研究

——屯堡的开放性与封闭性 李子磊(390)

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屯堡乡民社会文化发展 张金成 傅慧平(400)

附录:贵州省安顺屯堡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405)

历史考析

屯堡的前世今生

——从“抬汪公”民俗到吉昌契约文书的发现

万 明

看着桌上摆放着厚厚一叠孙兆霞等编的《吉昌契约文书汇编》书稿,我不由得沉浸在深深的喜悦之中。这是贵州民族学院孙兆霞老师带领“屯堡社会稳定性的宗教视角考察”课题组不辞劳苦,多次到安顺屯堡调查“抬汪公”民俗所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绩。应该说,这是一个关于安顺屯堡研究的突破性的发现和进展。

按理说,我是没有资格来写此汇编的序言的,但孙老师殷殷嘱托,盛情难却。回想起来,我与孙老师相识至今已近 10 年,可谓是有“缘”,因此也就有了“分”。特别是在屯堡文化研究领域,多年来活跃着一批勤奋有为的地方学者群体,在屯堡文化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绩,孙老师就是代表之一。我理应撰写一篇小文,对多年来在屯堡乡土沃壤中不懈耕耘的孙老师,以及地方学者群体表示敬意,也表达我衷心的祝贺。

屯堡的前世今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屯堡相遇,开始了相识、相知与相互切磋的交往过程。当我第一次听说安顺屯堡聚居着三四十万自称明朝屯军后裔、人称屯堡人的汉族居民,及其延续 600 多年前明朝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的时候,职业所系,我就想到必须去亲眼看一看这个地方。2002 年,我们承担所里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社会变迁研究”的课题组首次走进历史现场,就是到贵州安顺屯堡进行社会调查。当时孙老师与我院社会学所合作,正为完成国家重大项目“中国百村调查”而奔忙于屯堡的村落,重点是在九溪村。因此我们一到九溪村,就结识了热情豪爽的孙老师及其课题组的吴羽老师等。虽然我们调研的主题并不一致,一是纵向的历史深处,一是横向的现实社会,但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却是一个,即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开始在中外闻名遐迩的屯堡。在为期一周的社会调查中,我们在相知默契中进行。按照我们原订计划,在大西桥镇九溪村、吉昌屯村,七眼桥镇雷屯、本寨,以及平坝天龙镇、旧州镇实地调查访谈,寻找历史遗迹,包括家谱、碑刻、祝文等文字资料。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孙老师和她当时的安顺师专课题组全程陪同与大力帮助。并且经由她



介绍,我们也得到了安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晓先生的帮助。屯堡给我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也使我们获得了仅从史籍上无法得到的知识。在那里,我本人对于吉昌屯的“抬汪公”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致力于探索这一民俗活动与屯堡移民社会建构乃至晚明社会变迁的关系。回京后撰写了《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一文。再后来,我得知孙老师到了贵州民族学院,于2008年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西部课题“屯堡社会稳定性的宗教视角考察”,在社会调查选取的典型之一就是吉昌屯的“抬汪公”。2009年上半年传来的消息是,吉昌屯的“抬汪公”获得了中国第七届民间艺术节“山花奖”金奖;而到了金秋季节,我更欣喜地得知,在吉昌屯“抬汪公”活动的调研访谈中,竟出乎意料地发现了400多件契约文书,产生了《吉昌契约文书汇编》。这是屯堡尘封百年的文书第一次在世人面前显露,也是首次对屯堡契约文书进行系统的搜集和整理。毫无疑问,这是近年屯堡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发现。

“抬汪公”的调研引出了一批民间土地买卖等活动契约文书的发现,而契约文书的发现是偶然,也是必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屯堡文化研究逐渐兴起,进入21世纪,有着厚重底蕴的安顺屯堡文化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屯堡文化研究已经颇具规模。有些问题,表面看是文化,其实正是历史学、社会学的重要问题。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区别,就在于历史学研究过去,社会学则研究现在。在国外,有学者把社会学和历史学视为研究社会的两个拳头。无论如何,现在是从历史上走过来的,不了解历史,也就不能更好地了解现在。我欣喜地看到,清代以来屯堡契约文书的发现和初步整理汇编,正是课题组将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成果。

中国古代皇帝发布的诏令即“王言”,“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房,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皇帝的意志即国家的意志,由一纸诏令体现出来。明太祖调北征南的诏令传达之日,就是大规模军事移民开始集结之时。600多年来,这些明朝屯军的后裔世代生活于屯堡,成为国家与地方社会乃至国家与个体家庭关系史的活的见证。

贵州在明代建省,当时是全国13个省中最小的一个。作为省级行政建制,正是源自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军屯是明代土地国有的典型形态之一,明代军屯数量最大,为历代军屯之冠,在明初恢复农耕经济与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军屯达9000余万亩,为全国耕地的1/10以上。毫无疑问,安顺屯堡的形成与明代军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安顺在历史上被称为“滇之喉”、“黔之腹”,今天的安顺市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所建普定卫城的所在地。在安顺这片“山清水秀,田野肥沃”的土地上,卫所就地屯田,

屯军聚族而居,形成屯堡,世代相守。迄今在黔中安顺,以西秀区为中心,东到平坝,西到镇宁和关岭,南到紫云,北到普定,方圆 134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散布屯堡村寨达数百个,高度密集的屯堡群落,成为西南一带屯堡最集中的地方。吉昌屯作为典型的屯堡村寨,位于明代普定卫与平坝卫的分界处,属于屯堡的核心地带。

契约文书,是可以触摸到的历史。调查显示,吉昌契约文书总数达 452 件,分别由 16 个持有人提供,目前发现最早的契约是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签订的,最晚的一份签订日期是 1961 年,涵盖了 200 多年的历史时段。这些契约文书真实地反映了屯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同时也是屯堡人家庭经济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不言而喻,吉昌屯这批清代以来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的发现,保存了大量史籍文献根本没有记载的基层社会的原始资料,对于探讨屯堡社会实态具有重要价值。将尘封已久的这批清代以来屯堡地区社会经济契约文书稍加整理和研究,尽早地公布出来,以便学界同人分享,无异于为屯堡文化研究的热潮再添一把火,形成屯堡社会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良好契机。利用这些珍贵的契约文书,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屯堡人和社会生活,必将推动屯堡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里程。

在我国民间契约文书中,明清契约文书占有突出的位置,这是因为明清时代是我国契约文书门类最多、使用最为普及的时期,也因为它与近现代人们的财产关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傅衣凌先生等前辈学者就注意到明清契约文书的搜集和研究,50 年代徽州民间文书被大量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是国内外徽州文书的主要收藏单位之一,明清以后契约文书的收藏非常丰富,史料价值十分珍贵。已整理出版的有周绍泉、王钰欣主编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第一编·宋元明代编》和《清民国编》,历史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等。1995 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依托在明史研究室,以徽州文书的收藏优势,对明清历史的诸多领域展开研究。近年我们明史室承担院重点课题“明代诏令文书整理与研究”,启动于洪武朝,研究的重要取向之一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屯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典型。以往对于徽州汪公入黔问题的关注,已将屯堡与徽州连接起来,而吉昌契约文书的发现,无疑为屯堡社会经济契约文书与徽州社会经济契约文书的比较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

根据这些尘封 200 多年的契约文书,我们可以确认土地买卖是屯堡地区地权转移的主要方式。契约行文沿用的是与徽州文书一样的程式。例如买卖田地,开头写明立卖契人姓名,卖田地或房屋、菜地等原因,然后写清所卖田地等



的四至、名称、坐落位置、议定时价多少等。结尾常用“恐口无凭，特立卖契为据”，“今恐后人心不古，立卖契永远存照”等，以为取信凭证。契尾有代字人名，年月日期下写立卖契人姓名，并画押。契约中有杜卖契，也有典契，也就是活卖契等；白契为多，也有一些是红契，上面盖有清代普定县官印。以上说明，吉昌契约文书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文化特征，既有地方性，又有普遍性。当我们谈到屯堡的特性，就不能不谈到众所周知的军屯，这些契约中记录的是屯堡社会结构中人与人的土地关系，反映了屯堡人生活的实态。大量存在的科田，在明代已是民田的一种称呼，而曾为明代国有土地的屯田，到此时业已私有化，可以自由买卖，形成了土地契约文书。

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民间契约文书是维护产权所有者经济权益的原始凭证，对买主来说至关重要，虽经政治动荡和诸多战乱，至今世代流传，说明了契约文书对于乡村家庭的重要意义，屯堡也不例外。一般认为，清王朝废除屯田制，屯军失去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依靠，沦为与一般农民同等的社会地位。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实际上，明代军屯在晚明已经不可遏止地走上了私有化的道路，同时，屯军转变为自耕农的过程也早已开始。明嘉靖年间普定卫官军 6060 户 20400 丁口，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报存 1025 户 2837 丁口，反映了明代卫所军屯制度消亡殆尽的趋势。明后期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土地买卖盛行，土地契约也广为流行，白银货币化极大地影响和作用于整个社会，大大加速了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军屯的土地也被大量卷入流通领域，地权转移的背景折射了社会经济的变动，土地的占有者不断更替，土地制度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凡此均为社会变迁的重要表征，是屯堡社会发生重大变迁的真实记录。过去我们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不能清楚地了解清代以后发展的具体情形，而社会变迁在土地文书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近年全国各地明清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和刊布，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如今利用契约文书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可观，契约文书在学术研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研究价值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同。相信《吉昌契约文书汇编》的出版，把珍贵的屯堡原始资料及时刊布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必将有利于了解屯堡、认识屯堡、研究屯堡，契约文书将成为屯堡文化研究新的出发点，推动屯堡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作者简介：万明，女，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任、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

本文收录《吉昌契约文书汇编》。孙兆霞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

明清黔中屯堡的几个历史形态

吴 斌

平坝一程来普定，贵阳风景此平分。
几多衰草漫铺地，无数好山高出云。
尽有裔夷输职贡，不妨师旅乐耕耘。
诗成薄暮送归鸟，处处鼓鼙斜日曛。

[明]丁养浩《普定》

这首名为《普定》的律诗是明代弘治年间云南左布政使丁养浩从贵阳到云南的旅途中所作。除了描写平坝到安顺道中的美好自然风景外，难得的是描绘了当时屯军和少数民族和平相处的人文景象。因为是和平环境，民族和睦，少数民族向政府臣服纳贡，卫所屯军的主要精力就是生产耕耘。这是当时和平年代屯堡地区的历史画面，也是黔中腹地明代得以大力开发的白描图卷。

在数百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屯堡地区既有裔夷输职贡、师旅乐耕耘的和谐景象，也不乏烽烟四起、狼奔豕突的非常时期。无论如何，这个地区一直是黔中大地上的一块富有活力，生机勃勃的沃土。在这期间，生命在延续，文明在发展。从屯军后裔、汉族移民到清道咸时期屯堡共同体的最后形成，早已是沧海桑田，天上人间，无数屯堡人用他们个体和家族的历史共同建构了屯堡共同体的历史。

屯堡文化发端于黔中安顺，应该说有几个“非常”，即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常之态。

一、非常之地：国家意志上的交通要道

明初朱元璋军事力量强大，以致可以击溃蒙元，荡平宇内。朱元璋由淮右一介布衣而领有海内，全凭军事实力了得，以至于解缙在《大庖西封事》中称明太祖“得国之正，非汉、唐、宋所及”。

贵州真正进入中央政府有效控制实始于明初，即洪武年间平定云南之役



后。而贵州在未建立省级行政机构前即先有作为军事机构的都指挥使司,并且早于云南。贵州境内卫所设立也较早,洪武四年设立贵州卫(在今贵阳)。洪武四年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有卫所329个,仅贵州就有24卫。当时贵州还未设布政使司,在行政区划上这些卫所仍属于云南、湖广、四川。作为区域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的贵州都指挥使司设立于洪武十四年。

按明代军制,各地卫所的军队受所驻省的都指挥使司管辖,都指挥使司是省级最高军事机构,设都指挥使一人,都指挥同知二人,都指挥佥事四人。都指挥使统全局,都指挥同知及都指挥佥事分别掌管操练、屯田、巡捕、备御、出哨、戍守、漕运、军械等,各省都指挥使司又隶属五军都督府。^①都司下设若干卫,每卫5600人,设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四人,分工如同都指挥使司。除了通常的卫指挥使司外,还有权力更大、管辖范围更广的军民指挥使司,既可管军,又兼管地方土司。而每卫通常领有前、后、左、中、右5个千户所。如果地处军事要冲,卫可兼领地方的守御千户所。^②五个千户所称为“内所”,因其在卫城周围,守御千户所因离卫城较远,称为“外所”。每千户所1120人,每个千户所辖10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112人,由正、副百户统领,每百户领总旗2个、小旗5个,小旗领兵10人。就武官级别来说,省级军事首长都指挥使为正二品,卫的军事首长指挥使,为正三品武官,所的军事首长千户,为正五品武官,百户为正六品。

明太祖以武功得天下,天下初定后,大量的士兵如何安置,不战之时何以为生,国家如何供养他们,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明太祖善效古法,而屯田制无疑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傅友德上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余年,屡经兵燹,图籍不存,兵数无从稽考,但当以今之要害,量宜设卫以守……督布政使覆实云南、临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乌撒等卫及沾益、盘江等千户所,见储粮数一十八万二千有奇,以给军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县所征并故宫观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输、盐商中纳、戍兵屯田之入以给之。”^[1]朱元璋准其奏,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壬子(初六)(公元1388.1.15),朱元璋下旨:“左军都督佥事冯诚往谕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率湖广都司诸军驻普安分屯。”^[2]这样的记载不少,由此可见朱元璋不仅认识到了卫所屯田的重要性,而且大力推广屯田制。他曾这样对户部表示:“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3]明初民生凋敝,元代遗留的官田、豪强的私田及战乱后大量的民间荒田均可供屯军开垦,除了满足军需之外,亦可为国家输送大量粮食。而卫所士兵也不仅仅是手持兵刃的职业武士,他们可以战时为士兵,平时为农民,这些国家的戍守者也成为了数量庞大

的农业生产者。由此,“此销兵之术,所谓养兵百万不费民间斗粮也。数传而后化为农桑。”^[4]明太祖可谓远虑深谋,采用的手段也是务实而有效:动用国家机器,设卫所屯田,调动数百万人口迁徙。明朝究竟有多少数额的卫所军队?翁家烈先生调查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有卫所军人180万,设置都司17个,卫所329个,直属都司的千户所65个。如加上后来增设的所,全国应有军人200万以上。据弘治十四年兵部统计,“天下卫所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5]。如果按70%的军人屯田,那么明代的戍卒人数大概在140至200万之间。屯田制实施后,如何分配卫所士兵的屯田和戍守比例,明政府曾有明确规定。例如洪武二十五年曾经下令“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6],《明史》中亦有军屯、民屯及屯军受田的记载:“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7]永乐二年,调整士兵的屯田和戍守比例,因地制宜,较为灵活:“视其地之夷险要僻以量人之屯守之多寡。临边而险要者,则守多于屯;在内而夷僻者则屯多于守;地虽险要而运输难至者,屯亦多于守。”^[8]屯田旗军由国家拨给土地,配备生产物资,并携带妻子家眷一同前往。每个旗军配给的土地视不同地域、环境和所据地人口密度情况而不同,《明会典》称:“每军种田五十亩为一分。又或百亩,或七十亩,或三十亩,或二十亩不等。”平均为每个旗军五十亩,由此推算明初全国屯军垦殖的土地面积在70万公顷左右。后来由于屯政废弛,屯田面积逐渐减少:“自正统后,屯政稍弛,而屯粮犹存三分之二。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9]《明实录》载:成化三年三月,贵州总兵官毛奏:“贵州都司原设旗军161800余名,今止有28800余名。”

贵州境内卫所密度较高于周边的云南、四川、湖广,且大都处于交通要道。尤其突出的是,从湖南进贵州,经黔东南过贵阳、安顺、普安、兴义至云南的这条主干线,一直是最重要的交通命脉,卫所设置也最为频密。贵州二十四卫中,就有平溪、清浪、镇远、偏桥、兴隆、清平、平越、新添、龙里、贵州、贵州前卫、威清、平坝、普定、安庄、安南、普安等十七卫分布在这条横贯东西的通道上^[10]。

在威清、平坝、普定、安庄、安南、普安这六卫中,普定卫起上联下通的枢纽作用,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中这样描述:“卫冲要剧地,众山环绕,为边鄙一都会。山川阨塞,屹为边垒,襟带三州之区,控引百蛮之域。”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

二、非常之时:烽烟四起的明清时期

明清贵州境内征伐不断,屯堡地处交通要冲,并非世外桃源。明初明太祖

